

## Raising the Rate of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is the Key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Countryside

Zheng Zhenyuan

Association of Elder Scientific Worker of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Abstract:** Well cond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urban and countryside are all along the important affair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countryside afforded abund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labor forces, lands and funds for urban, but, by which it did not earne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main reason is due to the large gap of the net disposable incomes from business and real estate between urban household and rural househol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countryside have necessitated the promotion of countryside, whereas the promotion of countryside have necessitated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is not owing to lack of cropland, and lower productivity, but owing to the lower rate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then caused to lowering the income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also causing the crisis of bankrupt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Therefore, three propositions have being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those are stepping up the shifting of household register of the transferring rural population from countryside to urban; extending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adopting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 word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countrysid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 Shifting of household register of transferring rural population; Scal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Received: 2020-08-31; Accepted: 2020-09-08; Published: 2020-10-12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郑振源

自然资源部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北京

邮箱: zhengzybj@163.com

**摘 要:** 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历来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农产品和劳力、土地、资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没有带来城乡均富。乡村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的产业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远少于城镇居民。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振兴乡村，振兴乡村的第一要务是振兴农业。农业的问题不在于耕地少、耕地生产能力低，而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以致农业劳动者收入少，国际竞争力低，农业产业有被国际农业打垮的危险。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合理建议：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采用新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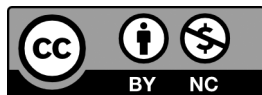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振兴农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经营规模

收稿日期：2020-08-31；录用日期：2020-09-08；发表日期：2020-10-12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1 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状况的回顾

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历来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2003 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列为五个统筹之首。2017 年中共十九大又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并同时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

在城乡关系中，乡村是第一产业（农业）和务农人口的聚集地。乡村的功能，除了生产农民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农产品生产外，还要为城镇发展提供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生产要素”和城镇居民生活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休闲旅游场所。城镇是二、三产业及其劳动人口的聚集地。城镇的功能是发展二、三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城镇有了自生能力之后，要向乡村提供资金（包括物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即所谓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农村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各种农产品外，还提供了 1.73 亿劳动力——农民工（2018 年），约 716 万公顷土地和 24.9 万亿元土地出让金收益中 50% 以上的资金（2001—2017 年）。丰富的农产品和劳力、土地、资金廉价生产要素的供给使城镇得以开足马力发展二、三产业，短短 40 年便使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地由 1978 年的 17.9% 提升为 2018 年的 59.6%，国民经济总量翻了五番，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城乡的发展并未带来城乡均富。反映城乡差距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比，1983 年为 1.7 : 1。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城乡收入比。到 2007、2009

年迅速扩大为 3.33 : 1<sup>①</sup>，成为世界倒数第三的垫底水平 [1]，城市繁荣，而农村萧条。此后，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大力开展扶贫攻坚行动，2013–2017 年中央财政投入 2822 亿元扶贫资金，地方政府投入 2794 亿元资金 [2]，使 2018 年城乡收入比降为 2.77 : 1。然而，与英美等发达国家 1.5 : 1 的城乡收入比相比，仍然处于高位 [1]。

## 2 农村相对贫困的原因

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看，农村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产业（含农林牧副渔）经营的净收入大大低于城市经营二、三产业的收入，其次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远少于城镇居民（见表 1）。

表 1 2013–2018 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单位：元）

Table 1 Structure of annual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 and rural household 2013–2018

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六年平均	城乡差距	城乡比倍数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26467.0	28843.9	31194.8	33616.2	36396.2	39250.8	32628.2	20744.3	2.7
1. 工资性收入	16617.4	17936.8	19337.1	20665.0	22200.9	23792.2	20091.6	14305.4	2.5
2. 经营净收入	2975.3	3279.0	3476.1	3770.1	4064.7	4442.6	3668.0		
3. 财产净收入	2551.5	2812.1	3041.9	3271.3	3606.9	4027.7	3218.6	2954.3	12.2
4. 转移净收入	4322.8	4815.9	5339.7	5909.8	6523.6	6988.3	5650.0	3409.5	2.5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9429.6	10488.9	11421.7	12363.4	13432.4	14167.0	11883.8		1
1. 工资性收入	3652.5	4152.2	4600.3	5021.8	5498.4	5996.1	4820.2		
2. 经营净收入	3934.8	4237.4	4503.6	4741.3	5027.8	5358.4	4633.9		1
3. 财产净收入	194.7	222.1	251.5	272.1	303.0	342.1	264.3		1
4. 转移净收入	1647.5	1877.2	2066.3	2328.2	2603.2	2920.5	2240.5		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 中国统计摘要。

农村产业的主业是农业。农业经营净收入少不是因为产出少。2013 年以来，在 20 多亿亩耕地上生产了 6 亿多吨粮食，产量不少了。不是因为粮价低，目前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1984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 年中国统计摘要。

国内粮价已高于国际水平,不能再提高了,也不是政府支农补贴给得不够。目前政府给的各种农业补贴已接近WTO规定的“黄箱”水平,不能再多给了。农业经营净收入少的原因主要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我国2014年以农业就业人数与农业增加值衡量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2006年欧元区国家的11.8%、日本的14.4%、美国的41%。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一半上下,而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4<sup>①</sup>。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农民收入少的主要原因。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少的原因:则是因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与国有土地的不平等,集体的宅基地、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其财产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兑现所致。集体土地非得征收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入市。2005年、2009年、2012年和2017年房地产市场全国平均土地出让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格)已经涨到每亩23.7、51.9、55.5、150.1万元,而同年全国平均征地补偿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价格)只有每亩3.5、4.1、4.4、7.0万元<sup>②</sup>,可见农民财产性收入损失之巨。

### 3 乡村振兴必须振兴农业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018年2月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并把产业兴旺置于五个总要求之首。9月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9年1月发布《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6月国务院部又发布《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连续4个中央文件都指出:

① 据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劳动力和产业产值数据整理而得。

② 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2005、2009、2012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自然资源部,2017年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产业兴旺了才谈得上生活富裕、乡村美丽。

乡村产业体系的主业是农作业（种植业），有了上规模的农作业产出，才有牧业、渔业、林业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物流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在脱贫攻坚行动中，一些农村靠发展旅游业、园艺业、畜牧业脱贫致富。2018 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营业收入超过 8000 亿元，但是这些产业的市场有限，总体上并不能改变农作业的主业地位。有人提出“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口号，这是错误的，农村要是工业化了，它就不再是农村，而变成了城市。村村点火发展乡镇企业的场景不会再次重现。8.5 亿农村常住人口分散居住在 317 万个自然村里，一个村庄平均才 268 人。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城市那样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永远变不成城市。所以，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是振兴农业。要使农作业成为有利可图、有奔头的产业，才能有乡村振兴。

## 4 振兴农业的出路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我国农业经过 40 年的发展，按实际耕地面积计算的粮食耕地面积单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单产 × 复种指数）已由 1983 年的 233.4 公斤 / 亩提高到 2013 年的 436.6 公斤 / 亩，2017 年的 461.2 公斤 / 亩，增长了 97.6%<sup>①</sup>，年均递增率 2.1%。这在国际上是少有的。2013 年以来，我国在 20 多亿亩的耕地上生产了 6 亿多吨粮食，人均产粮 440 公斤以上，以占世界 9%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19.1% 的人口，人均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计的营养水平达到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 90% [3]，成绩斐然。当前农业的问题，不是产出少的问题，而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劳动者收益就少。务农收益少，农村劳力便弃农而去，进城打工经商，留下“3860 部队”在家种地，从而产生谁来种地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并导致农地粗放利用，甚至撂荒。农村劳动力短缺，工价就上涨。劳力、农资价格上涨，种粮成本高而收益少，政府必须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政

<sup>①</sup> 因中国农业统计资料的作物播种面积数据不准确，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单产被高估了约 30%。故采用按 1980 年代土地利用概查和 2009 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后耕地面积变更调查数计算粮作耕地单产。

策抬高粮价以及增加农业补贴,使务农有微利,农民才有种粮积极性。这就是粮价和农业补贴居高不下的原因。粮价高到超过国外粮价,就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导致国外粮食大量进口。这就是 2015 年末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库存过量,财政亏损,粮价下挫的原因 [4],并使中国粮食生产,一如大豆产业,有被国际农业产业打垮的危险 [5]<sup>①</sup>,构成另一种形式的粮食不安全——产业不安全 [6]。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也是我国劳动力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以后,不能迅速转向第二拐点的原因。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产生种种农业问题的根源。所以,振兴农业必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5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一是农业劳动力弱,男少女多,年龄偏大。2016 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与农民工性别和年龄之比见表 2。

表 2 2016 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与农民工性别与年龄的比较 单位: 占劳动力总数 %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 and age of agricultural labors and migrant workers

	男	女	<35 岁	36—54 岁	>55 岁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52.5	47.5	19.2	47.2	33.6
农民工	65.1	34.9	<30 岁 31.8	31—50 岁 49.0	>50 岁 19.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资料[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国家统计局. 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 2017-04-28.

① 2003 年底由商务部副部长率领一大豆采购团到美国采购大豆,甫到美国,大豆就涨价,采购团以 4635 元/吨高价采购了 250 万吨大豆。采购的美豆刚到货,美豆价格就狂泻,跌回 2937 元/吨,造成国内大豆压榨厂巨额亏损。到 2006 年 97 家大豆压榨厂中 64 家为外资兼并。这些压榨厂只买进口的价廉物美的转基因大豆,不买国产大豆,以至于大豆进口量连年飙升,自 2006 年的 2877 万吨升到 2015 年的 8174 万吨,进口依存度达到 87%。而国产大豆则一路下滑,播种面积和产量自 2005 年的 959.1 万公顷、1635 万吨,跌为 2015 年的 650.6 万公顷、1178.5 万吨,使我国从一个传统的大豆出口国沦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见 2018 年中国大豆产量、进口量及进口依存度分析[N]. 中华粮网, 2018-04-10.

二是田场狭小。我国人多地少，农户承包的耕地少，而且 1983 年第一次发包时，为求公平分配，好坏搭配，把承包地分割得很零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 1999 年我国户均耕地只有 7.95 亩，还分割成 6.1 块。经过多年承包地流转，2006 年至 2018 年种植业（耕地）经营规模有所扩大（见表 3），但非常有限。

表 3 不同耕地经营规模农户占经营耕地农户总数比例（%）

Table 3 Percentage of peasant households by different scale of cropland to total peasant households

	每一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10 亩	10 ~ 30 亩	30 ~ 50 亩	50 ~ 100 亩	100 ~ 200 亩	>200 亩
2006 年全国	84.8	12.7	1.6	0.8	0.2	
2010 年全国	85.8	10.8	2.3	0.8	0.2	0.0
2013 年全国	85.9	10.3	2.6	0.9	0.2	0.1
2018 年全国	85.3	10.5	2.7	1.0	0.4	0.2
黑龙江	32.9	30.2	18.2	11.3	5.2	2.3
内蒙古	38.4	33.9	16.4	8.3	2.3	0.6
浙江	98.7	0.8	0.2	0.2	0.1	0.1
上海	99.2	0.4	0.1	0.1	0.3	0.0

资料来源：2006 年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2010、2013 年数据见刘守英，中国农地权属与经营方式的变化（2010-2014）[N]，中国经济时报，2016-02-19；2018 年数据见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8）[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2018 年 85.3% 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仍在 10 亩以下。即便在地多人少、农业经营规模大的黑龙江、内蒙古 2 省区，3 成农户经营规模在 10 亩以下，3 成农户在 10 ~ 30 亩，经营耕地 50 亩以上的农户不过占经营耕地农户总数的 18.8%、11.2%；而人多地少的上海、浙江则 98% 以上农户经营耕地都不到 10 亩。经营规模小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

农业劳动生产率高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指标。因此，振兴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6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不外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采用新的技术模式。

有人认为；我国人多地少，很多丘陵山区地块狭窄零散，不能在短时间内全面规模化经营，小农户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我国人多地少是事实，不能像美国那样发展上千公顷规模的家庭农场。但是，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40%的村庄在平原区，30%村庄在丘陵区，只有30%的村庄在山区。又据第二次土地调查，我国耕地坡度 $<2^{\circ}$ 的占57%、 $2^{\circ} \sim 6^{\circ}$ 的占16%、 $6^{\circ} \sim 15^{\circ}$ 的占15%。即88%的耕地坡度在 $15^{\circ}$ 以下，耕地经营规模扩大3、4倍以上应该没有问题。比我国更加人多地少的日本，1975—1983年8年时间，核心农户由495.3万户减为447.3万户，减少9.7%，耕地经营规模由户均2.16公顷（32.4亩）扩大到2.83公顷（42.5亩）扩大了31%。2011年制定《农业改革基本方针及行动计划》，要在5年内将每个农户或法人的经营面积扩大10倍，达到每户20~30公顷（300~450亩）。日本能做到的，我国应该也能做到。

为扩大耕地经营规模需要做好以下三件事：

**一是发展城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他们乐意转让村里的承包地、宅基地。**城镇是吸纳和转移农业人口的“磁极”。农业人口转移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前提。据农业部、农业农村部统计，2012年至201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14.3%，而同期全国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由22976万户减为22688万户，只减少了1.25%，说明有相当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或不愿意放弃村里的承包地、宅基地。

究其原因，应当看到农民也是精明的理性经济人，都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对于农民，具有财产效用、生产效用、保障效用、文化和心理安全效用。农民进城落户是其财产权益、生活方式的重置。当进城打工的收益预期超过其承包地的生产效益时，便转包、出租其承包经营权，进城打工，但不愿放弃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只有当进城落户得到的财产补偿、就业收益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利益预期超过其保留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的全部利益时，才愿意放弃其承包地、宅基地，落户城市，而把他们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乐意在家务农的种田大户。因此，农村转移人口市

民化的关键在于需要保证他们市民化后获得的利益大于他们在农村保有承包地、宅基地的全部利益 [7]。

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推行居住证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除少数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外，已放开了户籍制度的落户限制。2013 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 1 亿农村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即将胜利完成。要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 农民退出其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要能得到足额的财产权补偿。

(2) 城市要能提供农村转移人口住得起的住房。

(3) 城镇要有足够的公共服务设施，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其随迁子女不仅能接受义务教育，还要能参加中考高考。

(4) 推进社保体制改革，给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与城市户籍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

**二是加快加大承包经营权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家庭承包制实行不久，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和城市流动，中央就注意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984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1986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随着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种植专业户”。1995 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若干政策意见》更明确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02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上升为法律。200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要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培育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迫农民流转、通过流转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问题，依法制止乡、村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行为”。2014 年中

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行承包地“三权分置”，把出租承包地的债权关系改为物权关系，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同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了承包经营权流转“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植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提出“健全和推进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工作；规范承包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流转方式和流转行为；合理确定土地经营规模；扶植粮食规模化生产；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重点培育家庭农场；探索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等集体经营方式；扶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一系列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政策措施。同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2016年农业部印发《农村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

至此，中央对承包经营权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工作做了全面而具体的布置。十八大以来承包地流转明显加快。到2018年底，据农村农业部统计，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达到5.3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39%<sup>①</sup>。81%是以转包和出租方式流转。股份合作的占6.7%，互换的占5.8%，转让的只有2.7%。流转的去向：56.8%流入农户（包括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22.5%流入专业合作社，22.7%流入企业等经营主体。2018年底已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215.6万个，非土地股份合作社175万个，其中种植业合作社103.6万个，土地股份合作社14.1万个。

为加快承包地流转，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要加快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据农村农业部统计。到2017年底仅有88%的承包经营户拿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经营权证是承包地能够流转的必要条件。这项基础工作必须尽快完成。

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切不可为追求政绩，定指标，下任务，用行政手段流转承包地。这种现象，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已有减少。但村干部凭土地所有权人代表身份，与社会资本“合作”，整村的收回承包经营权，流

① 耕地流转面积是流出面积和流入面积的合计数。两数有重复。

转给外村人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应竭力避免。

要提倡市场化的流转方式。为解决承包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一种托管代耕的经营方式。承包户不流转承包经营权，只是把承包地托管给生产服务组织。由社会服务组织统一耕作播种、植保、收获。到 2017 年，已有 37 万个生产服务组织，约 17% 承包户接受生产托管服务，接受耕作服务面积达 2.9 亿亩，约占承包耕地 21%。这种经营模式解决了农户劳动力弱的问题，但是没有改变承包地地块狭小、分布零散的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限。而且社会服务组织只对耕、种、防、收每次作业的质量负责，不对最终产量负责，没有提高托管地生产率的积极性。

为扩大经营规模，要鼓励以市场方式流转其承包经营权。对于初期进城打工、就业还不稳定的“农民工”可以转包方式流转其承包地；对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应当鼓励其以出租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有资质的农业企业；在村里有组织经营能力强的带头人时，可以组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由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承包地；对于已经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则应提倡以一次性转让方式流转其承包经营权，避免经营户向承包户年年交租。

要让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自主选择合适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政府要做的事：一是组织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或服务中心）来解决承包户和承租户信息不对称，承包户找不到承租户或是承租户找不到承包户的问题。二是坚持《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的定价机制，又要对地租有所管控。防止财大气粗又不善稼穡的社会资本下乡圈地，炒高地租，迫使经营户将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甚至违约弃耕“跑路”。三是要解决租赁期限短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现在离第二轮承包期终结，只有 10 年，再延长 30 年，不过 40 年。流转期限短了，影响承租人对土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现在有些耕地经营权流转期一订就是 50 年。这算不算违法，应有一变通的说法。

**三要采用新的技术模式。**扩大经营规模只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第一步，还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模式。首先要进行土地整治（原称土地整理）。与村庄整理结合，重新布置道路、水利系统和防护林，水土保持工程，将小块农地并成

集中连片的大块。土地综合整治必然涉及承包经营权的调整和流转。要做好对接工作，有助于小块并大块，实现规模经营。

第二，要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化耕作技术、耕作方式和精准节水灌溉、大范围的防虫治病等在小农经营条件下未能实行的先进技术。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有很大提高。2017年农业机械总动力9.88亿千瓦，机耕面积1.24亿公顷，机播面积9181万公顷，机收面积9637万公顷。今后还能有巨大发展。有些农业大企业不注意采用机械化生产，还在使用传统的体力劳动，以致雇工工资支出过大，经营失利，足以为训。

第三，规模经营要取得规模效益还需要经营者要有足够强的经营管理能力。目前各地已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训计划。重要的是农业经营人员要在干中学，而不是培训好了再去经营。

第四，规模经营是资本密集型经营方式，需要政府和社会资金支持。资金支持有三种方式：一是各种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支农补贴。这些补贴应直接发放给经营户，而不是发放给承包户。二是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小农水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助。三是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政府资金有限，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支持真正的规模经营户，而不是用政府资金来“垒大户”。

实现了以上四个条件，农业经营者就能（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接近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均净收入。

所谓适度规模经营不能以多大经营面积来衡量，而要以农业经营者能否取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均净收入来衡量。农业经营者能取得社会平均水平劳均净收入的经营规模就是适度经营规模。这个适度经营规模，种植大田粮食作物和种植蔬菜花卉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不一样，不同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全靠农业经营者在经营中不断试错、探索才能确定[8]。

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则自会有人来从事农业生产。用不着政府动员人民下乡务农。谁来种地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 参考文献

- [1] 沈晓杰. 中国农村改革失败了吗? [EB/OL]. (2018-07-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670?adchannelID=&full=y>.
- [2] 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EB/OL]. (2017-08-30).  
<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708/0bf9704c18484ec4bb6921e85c674978.shtml>.
- [3] 联合国粮农组织. 走向 2015/2030 年的世界农业——FAO 的展望分析 [M].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4.
- [4] 陈锡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 [N]. 中国经济时报, 2016-07-15.
- [5] 臧云鹏. 中国农业真相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7-36.
- [6] 陈锡文. 中国农业发展的焦点问题 [J]. 农机科技推广, 2015 (7): 4-7.
- [7] 张学敏. 转移与退出: 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机制预警 [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 [8] 何秀荣. 关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思考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9): 4-14.